



上图：正在工作的草婴（1989年）。

少年时的盛姗姗，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只接触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高尔基的《我的大学》。改革开放后，发还家里不少书，使得她读到了肖洛霍夫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——正是父亲翻译的。尽管那个年月不少时光与父亲聚少离多，可对于当年的盛姗姗来说，她阅读着父亲的翻译作品，也阅读着父亲的翻译家朋友们互赠的作品，有一种独特的品味在心头……

在2018年开始重新编辑草婴译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，对照托翁原著核查的过程中，柏英常常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：“草婴先生，您这样处理是为了……吗？”“草婴先生，您这样转换真是妙啊。”与此同时，柏英心中也生出一个疑问：为什么草婴先生能够完整而精准地再现列夫·托尔斯泰的小说世界？由文本能否进入草婴的内心世界？总之，柏英品味出翻译家徐振亚老师的一句话：“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位作家、翻译什么作品，

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。草婴先生选择托尔斯泰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”终究，柏英得出看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小说的一个直感——“黑暗是路途，光明是去处”。

张盛海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自己从小看到外祖父“爬格子”。“他是极其自律的人。有着极强的时间观念。他曾言，自己吝啬时间，就如同犹太人吝啬金钱。”张盛海透露，草婴先生由于幼时体弱，而更感到生命历程的转瞬即逝。因此，他在不惑之年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巨著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制定了规划——70岁前翻译多少；80岁前必须完成翻译。“因此，外公那时候每天上午唤我起床，然后从8点开始工作，一直到12点。总之，一个上午是他的工作时间。起初，他每天翻译2000字，到上了年纪，就每天翻译1000字。”张盛海说，“别看外公总体来说一生是自由职业者，也就是说没有单位，不用去通勤，

可他对自己的时间管理比上班的人更严格。比如上午他工作时间是不接电话的。如果电话铃响，要么是外祖母接电话，要么是家里的保姆接电话。她们接完电话，将来电人和主要事由记录一下，下午外公才会一一回电。”

“父亲当年规划翻译托尔斯泰三大巨著，顺序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及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之后再‘攻’托翁大量的中短篇。”盛姗姗说，“我后来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，父亲一开始就把自己年龄、精力及健康状况考虑进去了，他要和时间赛跑，要以最可靠的方式尽力而为，把托翁的整座文学丰碑完美地迁移到中国来。”

改革开放以后，中苏关系正常化，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的发展，使得俄方也开始重视起草婴先生。

1985年，年过知天命的草婴访问苏联。“我也还没有年轻到可以慷慨地浪费青春年华的程度，也没有老到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。”这是他把自已的一大摞译本交给苏联作协时，面对他们的惊讶时所说的话。张盛海至今还在慨叹，自己的年龄逐渐接近外祖父当年访问苏联时的年龄，却至今很少见到有翻译家将一个外国作家的几乎全集给翻译出来。也正因此，他越来越感悟到外祖父当年事之重要意义。

“2003年，父亲八十岁。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称，‘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，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，中国读者能够认识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苏俄作家的杰作’。”盛姗姗说。时任俄罗斯驻沪总领事柯富安称，草婴先生是“连接两个伟大